



# 目 录

|                      |           |
|----------------------|-----------|
| 编者前言 .....           | 曾维术 / 1   |
| 塔西佗的编年方法与卷章划分 .....  | 莫 尔 / 8   |
| 首次行动中一例死亡 .....      | 伍德曼 / 25  |
| 提贝里乌斯登基 .....        | 伍德曼 / 45  |
| 编年形式、讣告与塔西佗的主题 ..... | 金格拉斯 / 81 |
| 提贝里乌斯的卡普里阿之旅 .....   | 伍德曼 / 100 |
| 权力的味道 .....          | 伍德曼 / 115 |
| 没有出现的凤凰 .....        | 凯特尔 / 144 |
| 提贝里乌斯的讣告 .....       | 伍德曼 / 162 |
| 皇朝政治的必然模式 .....      | 凯特尔 / 179 |
| 尼禄的异域都城 .....        | 伍德曼 / 194 |
| 尼禄宫中的业余戏剧 .....      | 伍德曼 / 218 |

## 编者前言

早在 1959 年,我国学界就引介了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在 80 年代,又相继译《纪事》与《编年纪事》。书是译过来了,该如何读呢?

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中国学人就与自家的文史传统一刀两断,走上了与西方史学接轨的道路。建立西方史学一科,就理解西方史书而言,的确有必要——我们总不宜用中国的文史传统、印度的文史传统(倘若有的话)去解读西方的史书,西方的史书还是要放到西方的史学传统中去读——可是,什么是西方的史学传统呢?

梁启超当年引进且随后成为学界主流的“史学”,是成形于西方 19 世纪的“历史学”。起初,此种历史学怀有雄心壮志,它企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而发现总体历史进程的规律、原则、观念或者目的。然而,雄心壮志很快就被证明是不自量力:二战结束后,无论是黑格尔的思辨历史哲学还是职业史家汤恩比的普遍史模式,都遭到了普遍拒斥。历史学剩下的工作,似乎只能是老老实实在地发掘手稿、整理档案、考辨文献,在穷尽汗牛充栋的资料后,重组所谓过去的事实。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现代史家们都心安理得地埋首于这平淡的“本职”工作。

后现代史学打破了现代史家们平凡的幸福。凭借现代语言学理论,后现代史学攻击现代史家还原历史真相的企图。他们认为,无论是“一手材料”还是“二手材料”,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史家的著述,都是广义的“文本”,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语言”。语言/文本与真实的过去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史家无法挣脱语言/文本的

藩篱而接触到真实的过去。况且,语言一旦说出,其意义便不受言说者控制:语言/文本的意义由读者赋予,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会产生新的意义,所有这些意义都同等有效——非但不能接触真实的过去,读者甚至不能真正理解史家写下的文本。

后现代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引起了史学界的剧震。反应激烈者对后现代史学展开了谩骂:后现代史学家正在“砸烂历史学家的饭碗”,他们是一群“兵临历史学科城下的智识领域的新蛮族”。反应冷淡者则试图“收起历史学科堡垒的吊桥”,安心于整理档案这项“核心工作”,对所谓的语言学挑战不闻不问。<sup>①</sup>另有一些史家,如写下《捍卫历史》一书的艾文斯(Evans, R. J.),则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后现代的挑战并予以回应。

艾文斯认为,后现代史学过于极端,历史文本及材料虽有一定的模糊性,但远不至于全然掩盖过去的事实;言词的意义虽有时出乎言说者所料,但更多的时候处于言说者的控制之下,否则我们的日常生活将无法正常运转。<sup>②</sup>试想,警察侦察案件时,常常碰到证人们给出的各种模糊的、相互矛盾的“文本”,难道警察就不能透过这些“文本”发现案件的真相吗?一位父亲向儿子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儿子对这番话有不同的体会,难道我们就此可以说,这位父亲当初并无明确的意思要告诉其儿子,谈话的意义都由儿子自行决定,而且儿子的每一次理解均正确?倘若语言真的如此不受驾驭,我们的日常交谈恐怕都成了无病呻吟。

后现代理论的困难集中体现于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上。假如文本阐释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后现代理论的著作本身是否可以应用这一原则?艾文斯以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后现代理论者在这方面奉行“双重标准”:当一名后现代理论者德曼(Paul de Man)被

---

① 艾文斯,《捍卫历史》,张仲民等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页8-11。

② 前揭,页103,111。

控犯有通敌卖国与反犹太主义的错误时,以德里达为首的后现代阵营起而为其辩护,声称批评者既曲解了德曼的作品,也曲解了他们为德曼所作的辩护。可是,既然语言/文本具有无限的阐释可能性,既然不可能真正把握言说者的原意,何来所谓的曲解?德里达们又有什么理由义愤呢?①后现代理论经不起现实与常识的考验。

尽管如此,后现代史学挑起的论争却有助于现代历史学反思自身的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史学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正如艾文斯所指出的,现代历史学正逐渐从文献崇拜中走出。②近两百年来,现代历史学固步自封于整理档案的堡垒之中,故纸堆的霉味早已麻醉了现代史家的神经。如今,后现代史学凿开了这个堡垒,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首先,我们有机会重新理解修昔底德的政治史。

过去,修昔底德一直被认为是客观历史写作的古代典范。现代实证史学往往将自己的史学观念追溯到修昔底德,并引以为豪;同时,亦用实证史学的标准来衡量修昔底德,批评修昔底德那些不够“实证”的做法;譬如,修昔底德编造而非如实录入历史人物的演说词,修昔底德过分关注政治而忽视了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等等。如此褒贬显示出实证史学的过分自信,他们从未想过,修昔底德可能来自另一个不同的传统。一旦我们从实证史学的堡垒中走出,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能否把修昔底德的作品称之为“历史”,依然是一个问题。

有人会说,如此问题不过是哗众取宠,修昔底德曾在一段序言性质的文字中提到,他要为希腊人就希腊事务提供一份连续、详尽、纪年正确的叙述,涵盖波斯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半岛战争开始这段时间(《伯罗奔半岛战争志》1.97),这不是“历史”又是什么?持该质疑的读者没有看到,修昔底德这段序言只是“第二序言”,旨在为其

① 前揭,页232-238。

② 前揭,页3。

偏离正题转而叙述雅典帝国的形成过程(1.98-118)辩护。在描述全书性质的“第一序言”(1.20-22)中,修昔底德所交代的写作理由恰恰与“第二序言”那种史观相反:修昔底德写伯罗奔半岛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而“第二序言”那种颇为现代的史观并不区分重要与不重要,“它令自己的光芒绝无偏见地抑或完全冷漠地普照一切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时期”。<sup>①</sup>事实上,从作品的整体语境来看,修昔底德叙述雅典帝国的形成过程,也并非如“第二序言”所说的那样意在提供一份可供备案的“信史”,那段叙述其实点出了伯罗奔半岛战争最真实的原因。<sup>②</sup>

总之,修昔底德并没有写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他不是记录前431年至前411年间希腊人无数大大小小的活动交织而成的、那个我们习惯称之为“历史”的东西。修昔底德选择书写一场最大的战争。战争是人类生活的极端表现,最大的战争能最好地反映人类生活的本相。修昔底德的作品因此重点不在于寻求“真实的事实”,而在于寻求“真实的原因”<sup>③</sup>——我们最好把这样的作品称为纪事。纪,《说文》:“丝别也”。王筠句读:“纪者,端绪之谓也”,亦即散丝的头绪。“纪”与修昔底德作品的探究之意正相吻合。从内容上看,中国古代的“纪”记载帝王之事,与修昔底德的政治关怀亦可对应——纪事欲探究人类生活的本相,必然要关注政事,因为惟有政事才是人类生活的焦点。现代史学的注意力偏离政治领域,意味着背离那些与我们生死相关的问题。<sup>④</sup>

为修昔底德的作品正名后,我们同时亦可理解,为何修昔底德

---

① 施特劳斯,《修昔底德:政治史的意义》,载于《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页135。

② 施特劳斯,《城邦与人》(*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1964),页181。

③ 同上,前揭。

④ 施特劳斯,《修昔底德:政治史的意义》,载于《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页162;《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页140。

要自己编造演说词。如前所述,修昔底德的纪事所追求的真相,重点不是所谓“真正的事实”,即过去真正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而是“真正的原因”,首先是伯罗奔半岛战争的真正原因。要探寻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修昔底德不仅需要自己编造演说词,甚至需要编述发生过的事件——拣选与排列事件本身就是编述。因为,战争的参与者、目击者对该战争的印象常常是片面、错误的,也常常相互矛盾,不经过编撰,写成的作品无论如何反映不出伯罗奔半岛战争的真相,就好比拼凑几个盲人摸象后的印象,得不出大象的样子。这一点也为个别现代史家所认识到。艾文斯就认为,史家要发现真相,不仅需要考订材料,还需要一些“想象力”。<sup>①</sup>艾文斯认为是“想象力”的东西,在修昔底德看来是某种智见:只有具有最高军事洞识的人才能看到真实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只有智慧者才具有整体的视野。智慧者的编撰,其实是把每篇零碎的言辞、每个局部的行动归入整体中真正恰当的位置。<sup>②</sup>因此,由智慧者编撰的纪事,非但不会像后现代史学认为的那样,因为编造而接触不到真相,而且恰恰是因为编造,它比实证史学的“实录”更能揭示真相。

有人会问,修昔底德的纪事要揭示人类生活的本相,这跟 19 世纪的历史学要发现历史的规律,有何不同?我们说,正如修昔底德没有写作现代意义的“历史”,他也没有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的研究对象、一个自成一体的领域,当然也就谈不上发现“历史的规律”。把“历史”当成一个知识对象来研究,大概要等到 18 世纪历史主义兴起之后。<sup>③</sup>

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修昔底德属于一个有别于现代实证史学的传统。那么,塔西佗的作品应该放到修昔底德的纪事传统

---

① 艾文斯,《捍卫历史》,前揭,页 252。

② 施特劳斯,《修昔底德:政治史的意义》,前揭,页 155。

③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与历史》,载于《什么是政治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中去读吗？当我们尝试这样做时，却发现明显的困难。修昔底德的纪事只编造了演说词（而且还尽量保持实际讲话的大意），并没有编造（生造）事件与人物，尽管事件也经过挑选与安排。塔西佗却似乎有生造事件的嫌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提贝里乌斯对伽尔巴的预言，塔西佗将这次预言安排在公元33年，而狄奥（Cassius Dio）安排在公元20年，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则将它写成是由奥古斯都说出的。对于几十年前的事件，记忆会如此混乱吗？就好比我们现在回望民国的事件，纪年会有那么大分歧吗？倘若有人坚持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三人各自使用了不同的史料，那么里波·杜路苏斯（Libo Drusus）一案无论如何让人怀疑塔西佗造假（《编年纪事》2.27-32）；维列乌斯（Velleius）、塞涅卡（Seneca）、苏埃托尼乌斯、狄奥都把里波描写成一个阴谋造反的分子，只有塔西佗把他描写成一个无辜、荒唐又可怜的年轻人，并以其悲惨遭遇凸显提贝里乌斯的丑恶。<sup>①</sup>

事实上，不止一名学者指控塔西佗歪曲事实，而修昔底德很少遭到这样的指控。从另一个方面看，塔西佗似乎真的没有修昔底德看重“真实”：他记载了好些看上去子虚乌有的事，譬如埃及出现了一只凤凰，卢米那里斯的枯木逢春等等，修昔底德却在第一章就抨击诗人撒谎。看来，塔西佗的作品有自己的独特品性，它可能属于一个既有别于修昔底德也有别于现代史学的传统。可是，有这样的传统吗？

有，它就是柏拉图—塔西佗的纪事传统。现代读者习惯了学科分割，难以接受纪事家塔西佗与哲人柏拉图扯上关系，这也是该传统被长期遗忘的原因。然而，只需举出两个事实，便可证明这种“身份标签”不可靠：塔西佗也写过一篇哲学小对话，里面有关于最佳政制这一哲学命题的探讨；塔西佗同时还是杰出的演说家，因此，用

---

① Frank Burr Marsh,《塔西佗与贵族传统》（“Tacitus and Aristocratic Tradition”），载于 *Classical Philology*, 21, 1926, 页289-310。

“纪事家”这一标签来概括塔西佗局限太大。况且,塔西佗的作品本身有内证,可以证明塔西佗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在《编年纪事》中,塔西佗引用了柏拉图《高尔吉亚》中的一段话,证明僭主的灵魂伤痕累累(《编年纪事》6.6)。塔西佗称这是“智慧最卓越的人”经常讲的话,“智慧最卓越的人”不是指柏拉图就是指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塔西佗对柏拉图的推崇可见一斑。

不过,柏拉图-塔西佗这一纪事传统湮没已久,要想重拾其端绪,并非易事。当下亟须澄清的是,柏拉图那极富文学性、同时也被人视为哲学的作品,为何又可以称为纪事,这种文学性极强的纪事与修昔底德的作品又有何差异。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首先从那些感觉到柏拉图-塔西佗纪事传统存在的现代学者开始。伍德曼(A. J. Woodman)是这种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他宣称,自己一点都不关心“实际发生了什么”,相反,他关心的是塔西佗如何写以及为何这样写——后面这一点使他与后现代史学家区别开来。尽管因为关注叙事,伍德曼被国内史学界划分入后现代史学的阵营,但其实所谓的叙事主义分成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后现代,他们以现代语言学理论、文艺理论拆解经典文本,并不在意经典作家本人的意图;一种便是伍德曼这种力图追溯作者意图的学者。伍德曼在古人面前保持了难得的谦虚:别的学者在质疑塔西佗作品里的不连贯之处,伍德曼却强调,我们必须至少假定,塔西佗没有呈现不连贯的描绘,因为塔西佗比我们高明得多。正是这种难得的谦虚使伍德曼发现了许多现代史学家发现不了的东西,这再一次告诉我们,要想接近柏拉图-塔西佗的纪事传统,必须放下自以为是的偏见。

曾维术

2011年9月

# 塔西佗的编年方法与卷章划分

莫尔(Frank Gardner Moore)撰

曾维术 译

塔西佗筹划自己的《神圣的奥古斯都驾崩后的编年纪事》(ab Excessu Divi Augusti)时,<sup>①</sup>可能只是沿用了《纪事》已经采取的方式。一般的印象是,《纪事》并不像真正的编年纪事,不像那些统称作编年纪事的作品。之所以有这一印象,纯粹因为我们只知道公元69年和公元70年的叙事,我们没有停下来问问,剩下来的二十六年——一直到多米提亚努斯(Domitianus)之死——会得到怎样的处理。若我们此刻假定,《纪事》原来有十四卷,我们就有五卷关于这最为多事的两年,故事以这两年开始;九卷关于剩下的二十六年,或者说,遗失的第六至第十四卷,平均每卷覆盖的时间稍少于三年。若以此与《编年纪事》比较,以完整的八卷——卷一至卷四和卷十二至卷十五——为代表,我们发现,这几卷平均每卷3.8年。因此,在这两部作品中,塔西佗采用的步调基本一致,如果我们乐意假设《纪事》有十二卷,那么,卷六至卷十二平均起来会是3.7年,几乎就是我们从《编年纪事》可以准确推算的部分得出的数字。<sup>②</sup>毫无疑问

---

① [译按]这是《编年纪事》的拉丁文全名。

② 至于每卷的实际长度,《纪事》完整留存下来的各卷,篇幅要稍长于《编年纪事》前四卷诸卷。《编年纪事》卷十二到卷十五,与先前诸卷相比,长度再次明显缩减。这样,这三个四卷编组,相互之间的比例是6:5:4,这个结果来自对Halm本(Birt, Das antike Buchwesen, 329)完整行数的计算,我自己的粗略估计则基于Fisher本,分别为14:11:9。

问,我们有各种理由相信,《纪事》的纪年特征与《编年纪事》一样,各卷的划分,自始至终显示同样的谋篇技巧与戏剧效果的技巧,显示同样的对纯粹编年方式的摆脱,从《纪事》与《编年纪事》两部作品的存世部分,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种解放。

扫一眼《编年纪事》前六卷每卷的开篇辞,我们会觉得,日渐成熟的纪事作家变得更为稳健,堕入古老的以一年开始一卷的方式。因此,卷二、卷四、卷五以执政官之名开篇。同样,匆匆点阅一下后来各卷,我们会产生这一印象:他再次改变了主意;卷十一至卷十六中,只有第十四卷以历法纪年开篇。但是,在可以下任何可靠结论之前,我们必须更有耐心,对这位编年作家的足迹作一通篇追踪。

我们发现,年度划分不仅仅出现在传统的词语 *consulibus* [执政官] 上,或者出现在那一旧词的巧妙变化上,而且出现于那些整齐地排列一个事件的段落符号里: *eodem anno* [同年]、*isdem consulibus* [同一执政官], 或者出现于那些讣告标志里,诸如 *fine anni* [年终]、*eo anno* [那一年] 等。这些表达必定吸引眼球,正是凭靠这些表达,编年计划得以彰显,如同录入日期的方式一样。

我发现,在四十三年内(忽略公元 29, 37 和 66 年),这些次级年度标记不少于五十五次,最频繁的是 *eodem anno* [同年], 出现了二十次。一份关于这些表达,以及其他有助于编年效果的笔法的完整表格,显示出它们尤其集中于特定几卷,如卷二、卷六、卷十三和卷十四。这些公式大部分预先告知读者,下一个执政官纪年很快就会到来。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不那么老套的暗示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包括以任何形式提及那一年死去的显要人物,因为塔西佗习惯于在一年尽头写他的死亡启事。在四十三年内,只有六年没有 *eodem anno* 或其等价物。<sup>①</sup>

---

① 这六年为:

公元 18 年(卷二,第 53 到 58 节): 这一年平静无事,六个章节就足以将这一年叙述完毕,因为一切都与日耳曼尼库斯或披索以及东方有关,西方(转下页)

至于用来标志新年伊始的形式,那就更重要了。这些形式有四分之三显示由来已久的公式——*consulibus* 或者 *-et-consulibus*, 四分之一因应上下文而选择各种变化。甚至旧公式出现的地方,也有故意的变化,视是否给出首名或族名加姓或单独一个族名而定。进一步的变化,可以这样产生:以一种方式对待一个名字,另一方式对待另一名字;或者偶尔插入 *et* [和]。这种变化在 *consulibus* 这一标志上出现了四次,这种非正式的形式必定省略首名,于是,在两执政官恰巧同姓的情况下,我们便得到了这一令人瞩目的变种:“这一年路

(接上页)没有什么事件被记录下来。

公元 27 年(卷四,第 62 到 67 节):再次是六节叙述一年,这一年引出提贝里乌斯退隐至卡普里阿的情节,然后是一些新闻琐事:费迪纳圆形露天剧场的倒塌,凯里乌斯山的大火,一两件控诉。

公元 34 年(卷六,第 28 到 30 节):这一年只有三节,一节描写埃及重新出现了凤凰,另外两节从僭政的土地上搜集那些通过自杀而解脱的人,以及遭到惩罚的控告者,还加上一个新鲜的细节:上日耳曼的盖图里库斯(*Lentulus Gaetulicus*)与提贝里乌斯的交易。

公元 48 年(卷十一第 23 节至卷十二第 4 节):共二十节,处理高卢与 *ius honorum* [荣誉法]、克劳狄乌斯的演说、人口普查;最后,以第 17 节构成一个单元,讲述美萨里娜倒台的故事。

公元 50 年(卷十二第 25 节至第 40 节):共十五节,始于收养多米提乌斯,然后转到日耳曼的事务,之后讲述欧司托里乌斯(*Ostorius Scapula*)及其继任伽路斯(*Didius Gallus*)在不列颠领导的几场连续的战斗。塔西佗需要十节来处理这次对编年传统的偏离,他在第 40 节解释了这次偏离。

公元 52 年(卷十二第 52 节至第 57 节),共六节——放逐司克里波尼亚努斯(*Scribonianus*)以及更琐碎的事件;奖赏帕拉斯,他的兄弟费里克斯(*Felix*)在犹太地区的混乱统治;奇里奇阿(*Cilicia*)叛乱;克劳狄乌斯开通富奇努斯湖(*Lacus Fucinus*)隧道。

公元 59 年不算例外,因为在该年结尾我们发现 *Sequuntur virorum illustrium mortes* [继而两个显要的人物去世](卷十四,第 19 节),我们把这归为引入讣告的其他形式,通常标志着一年结束。上面提到的六年,有四年(18, 27, 34, 52)平淡无事,很快就打发了。另外两年没有机会使用 *eodem anno* 或者其他公式。

贝里乌斯(Rubellius)和富斐乌斯(Fufius)任执政官,两人都姓盖米努斯(Geminus)。”(卷五,第1节)更有趣的是这些完全抛弃传统的纪年:

公元18年:下一年,提贝里乌斯第三次、日耳曼尼库斯第二次担任执政官。(卷二,第53节)

公元21年:随后是提贝里乌斯第四次,杜路苏斯(Drusus)第二次执政,这是父子之间一次著名的合作。(卷三,第31节)

公元22年:盖乌斯·苏尔皮奇乌斯(Sulpicius)和戴奇姆斯·哈提里乌斯(Haterius)的执政随后到来。(卷三,第52节)<sup>①</sup>

在这一不寻常的变化之后——一卷之内便有三个例子,而且是连续的三年——塔西佗重归老路,以 *consulibus* 记录了几年。但是,在仅仅一卷之内,再一次出现了三个变化:

公元32年: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Domitius Cn.)和卡米路斯·司克里波尼亚努斯(Scribonianus)就任执政官,当时提贝里乌斯……(卷六,第1节)

公元36年:克温图斯·普劳提乌斯(Plautius Quintus)和塞克斯图斯·帕披尼乌斯(Papinius Sex.)的执政随后到来。(卷六,第40节)

公元37年:不久之后,提贝里乌斯当政时期的最后两位执

---

① [译按]中译很难表达出拉丁文原有的差异,故将拉丁原文附上,下同:18 A. D. (2. 53), Sequens annus Tiberium tertium, Germanicum iterum consules habuit. 21 A. D. (3. 31), Sequitur Tiberi quartus, Drusi secundus consulatus, patris atque filii collegio insignis. 22 A. D. (3. 52), C. Sulpicius D. Haterius consules sequuntur.

政官格涅乌斯·阿凯罗尼乌斯(Cn. Acerronius)和盖乌斯·佩特洛尼乌斯(C. Pontius)就宣誓就职。(卷六,第45节中间部分)<sup>①</sup>

我们注意到,《编年纪事》后半部分在这方面有显著差异。因为后半部分只有两次打破旧公式:

公元58年:尼禄第三次担任执政官时的同僚是瓦列里乌斯·美撒拉。(Valerius Messala)(卷十三,第34节)

公元65年:涅尔瓦(Silius Nerva)和维司提努斯(Atticus Vestinus)于是担任执政官。(卷十五,第48节)<sup>②</sup>

我们已经注意到,《编年纪事》存世各卷中,只有四卷(卷二、四、五、十四)是以纪年开篇。几乎在余下的每一卷,我们都能发现,为何一年之始的地位不如一卷之始重要。毫无疑问,这位纪事作家的单位是一卷(liber),在进入“卷”这个更大的框架时,他必须想办法调整年份——年份很难符合同一兴趣标准。重大事件或那些兴奋点,如有可能,必须适当地分配到一卷的开头和结尾。他可能不想忽视以李维为代表的艺术传统,也不想回到最早的编年纪事那种死板的结构。

《编年纪事》各卷,开篇富有戏剧性或者引人注目的有:

---

① 32 A. D. (6. 1), Cn. Domitius et Camillus Scribonianus consulatum inierant, cum Caesar, etc. 36 A. D. (6. 40), Quintus Plautius Sex. Papinius consules sequuntur. 37A. D. (6. 45 med. ), Neque enim multo post supremi Tiberio consules, Cn. Acerronius C. Pontius, magistratum ocepere.

② 58 A. D. (8. 34), Nerone tertium consule simul iniit consulatum Valerius Messala. 65 A. D. (15. 48), Ineunt deinde consulatum Silius Nerva et Atticus Vestinus.

卷一：以奥古斯都驾崩开始。

卷三：阿格里披娜(Agrippina)带着日耳曼尼库斯的骨灰登陆。

卷四：谢雅努斯(Sejanus)得势，提贝里乌斯统治的转折点。

卷五：里维娅(Livia)之死。

卷十四：谋杀阿格里披娜。<sup>①</sup>

结尾富于戏剧性的有：

卷六：提贝里乌斯之死，结束了作品第一大分组。

卷十一：美撒里娜(Messalina)之死。

卷十二：克劳狄乌斯(Claudius)之死，作品的第二大分组。

卷十四：屋大维娅(Octavia)与帕拉斯(Pallas)之死，酝酿中的阴谋。

卷十五：披索(Piso)阴谋之后的恐怖统治没有其他情节那么引人注目，但塔西佗在此作出总结，可能标志着作品另一分组的结束(参下文，页15)。

[卷十六，可能以尼禄之死结束(参下文，页15)。]

那么，就存世各卷而论，《编年纪事》第一部分的开篇更引人注目，第二部分结尾更引人注目。

这位纪事作家放开手脚，提前叙述某些不是发生在那一年早段的重大事件，这种无视历法的笔法，其正当理由便在于获得戏剧性的开头。著名的例子是卷五和卷十四，在这两卷里，塔西佗无视精确的时间，提前叙述两位皇后之死，而且，由于以纪年开篇，这一效

---

① 卷四、卷五与卷十四一开始就提及了新执政官，因此，产生戏剧性的条件与最严格的编年要求重合在一起。

果大为增强。另一个标记时期的原则,为卷四开篇带来谢雅努斯的进场,伴随着谢雅努斯的恶劣影响,我们进入了提贝里乌斯统治的第二阶段。

不过,要详细阐发塔西佗的方法,我们必须按顺序处理各卷,逐一考虑每个例子,看看在这一连串肃剧故事中,保留了多少编年纪事的写作传统。然而,篇幅所限,在此我们不能对《编年纪事》的内容作这种分析;我们必须马上转入《纪事》。

人们常常认为,塔西佗以公元 69 年 1 月 1 日——伽尔巴 (Galba) 遇刺前两周——开始自己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其理由仅仅是这样做能让罗马人感到满意,这些罗马人早已习惯于编年纪事作家的写作。<sup>①</sup>既然一些重大事件能立刻吸引住读者的眼球,为何塔西佗还以一个单纯的历法纪年开篇? 荷西菲尔德 (Hirschfeld) 走得如此之远,他说:“塔西佗自己最后、最成熟的作品,确实避开了这种艺术上的错误,并以奥古斯都之死开始他的叙述,但是,他不敢完全抛开这种编年方法的羁绊。”<sup>②</sup>难道公元 69 年 1 月 1 日真的如此不值一提? 莫非以那一时刻开篇是一个艺术错误?

首先,我们必须铭记《纪事》大致的计划,塔西佗在开篇几节为我们作出了解释。这部作品要处理的是佛拉维乌斯皇朝的统治,在此之前,先要描述把这一家族推上王位的斗争。这一预备性的描述尤其包括维斯帕西亚努斯 (Vespasianus) 与维提里乌斯 (Vitellius) 之

---

① 因此, Courbaud 在自己的《塔西佗〈历史〉中的艺术手法》( *Les procédés d'art de Tacite dans les "Histoires"*, 1998 ) 页 33 说道, 塔西佗跟随这一方法, “唯传统精神是从”; “特别是塔西佗, 不管时代的差异, 不管艺术的发展, 不管这一布局的缺陷, 这位编年史家通过叙述安排, 在《历史》中保留了一种守旧的精神……拒绝摆脱传统, 并将一直保留到其生涯终点” ( 页 34 )。蒙森以这样的短语表达了责备: “他的做法没有好处”, “开端没有选好” ( *Herm.* iv, 页 299 ); 他给出这样的解释: “人们看到, 为了接续《编年纪事》, 塔西佗的书从公元 68 年写起。” ( 同上, 页 301 )

② 《小作品》( *Kleine Schriften* ), 页 855 ( *Herm.* xxv, 1890, 页 363 )。

间的内战,以及这一内战的序曲——维提里乌斯同样突然的篡权。人们不可避免地想起一月份的第一天,想起当天莱茵河军团的叛变行为,其时,军团被召集起来向伽尔巴重新宣誓效忠。到了1月3日,莱茵河所有军团都已承认了维提里乌斯。毫无疑问,对塔西佗而言,这是个再好不过的巧合,使他得以以历法纪年开篇;<sup>①</sup>但是,我们越是掂量这个问题,确定这样一个日期就越困难:一个较少犯错的艺术家的,利用此日期可能制造出完美的开头——这个完美的开头当然不是以贝德里亚库姆(Bedriacum)首场战役与奥托自杀开始,这些大部分都由那场肃剧构成。从严格的佛拉维乌斯皇朝立场来看,奥托的统治只能被视为一段插曲,因为日耳曼军队既然可以背叛伽尔巴也必定会继续背叛他那位暴发的继位者;以这一观点来看,一切仅仅导向维斯帕斯亚努斯的大权。因此,一段佛拉维乌斯朝的纪事,若以公元69年1月1日之后的任何一天开始,看上去都不合时宜。

有人认为,若塔西佗以几个月前尼禄的倒台开篇,会得到一个更富艺术性的导言,这一看法忽视了某些至关重要的考虑。首先,尼禄之死(Finis Neronis)本身就是一出多幕肃剧,其中一幕会把读者带回高卢,见证温代克斯(Vindex)那场夭折的反抗,另一幕将会把读者带回西班牙,见证伽尔巴的兴起。这需要整整一卷,而且这卷包含的叙述起点,不得晚于公元68年春。其次,尽管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塔西佗的脑海已经明确形成了《编年纪事》的计划,但他把尼禄之死留待另一部作品的结尾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无论如何,在当时着手写作的《纪事》的开头处理尼禄之死,并不合适。一个人不会详述毁灭前朝的动乱,以开始新时代的纪事。相反,他要记录一个新时代,只会简短地回忆这些与旧政制相连的事件——这些

---

① 可能作为 Fabius Rusticus 的后续。无论如何,不管这种与前辈的关联确有其事,还是仅仅是传说,罗马人都不會吹毛求疵。